

1973年基辛格訪華與 「幫周會議」風波

• 史 雲

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訪問中國四天多裏，會見了毛澤東，並與周恩來、葉劍英多次會談。基辛格走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周恩來被迫做了違心的、甚至是過份的檢查。當時的傳言是：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對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訪問中國。四天多裏，他會見了毛澤東，與周恩來、葉劍英進行了多次會談。訪問公報裏並沒有甚麼震驚中外的新聞。然而，基辛格走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令美國人大惑不解，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不明內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澤東指示，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江青集團乘機大肆攻擊周、葉。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甚至是過份的檢查。這次事件被中共黨史界稱之為所謂「幫周」會議。

三十多年過去以後，由於缺乏資料，這次事件仍然撲朔迷離。當時的傳言是：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對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中共中央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還有人提出，周恩來並沒有任何錯誤，是毛澤東在聯美反蘇戰略問題上態度「出爾反爾」。現在的研究者中，也有着種種不同的說法，多因周後來受到嚴厲錯誤批判而持同情態度。孰是孰非？本文根據一些新的材料進行了考證和分析。

一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疑慮

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了空缺。從50年代起，毛澤東就在為接班人的問題苦苦思考。在設置中央一線、二線的講話中，他確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但是，隨着大躍進的失敗，劉少奇愈來愈顯示出對毛的一些思想、路線、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運動「二十三條」的時候，毛開始考慮更換接班人。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庫的談話中提出了關於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條件。但是，這些條件都是目標性的，並沒有可操作性。

文革發動之時，毛澤東確定了林彪作為接班人。原因之一，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階級大搏鬥」中獲得軍隊支持，穩定局勢。他內心裏並不覺得林是合適人選。這一點，連林本人也認識到了。於是有了70年代初期的激烈鬥爭。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在反思中總結選擇接班人的教訓，一條就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和他共同開創事業的戰友，很難理解新的開創——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須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中選擇。但是，這種人資歷甚淺，也沒有治國經驗，還必須有合適的人來輔佐。另一條是，接班人不宜像過去選林彪那樣只確定一個，過於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繼續考察和調整的機會。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選有：周恩來，張春橋，鄧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齡稍大外，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都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人選。但是，毛澤東從建國後，從來沒把周當作接班人考慮過。其歷史原因，是他認為周在關鍵時刻容易動搖，難以把握正確路線。首先是30年代在中央蘇區時期，周恩來作為最高決策層成員，與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傾錯誤路線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戰時期在長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進」；第四，周恩來在文革中，總是表現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後，毛又出現了新的疑慮。

林彪事件中，周恩來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籌劃局勢的穩定和善後工作。最長的一次，有兩天兩夜以上沒有合眼。儘管周恩來自己謹慎地不出人頭地，但他的運籌帷幄、無私奉獻仍然不脛而走，傳遍全國，確實是眾望所歸。

在打開中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策中，雖然最高決策是毛澤東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澤東設計和批准的，但是國內外對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神采奕奕的周恩來往來迎送、演說講話、磋商談判。再結合到周恩來向來是溫和派的代表，因此，國際上幾乎都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的主角。一時期，國外報章對周好評如潮。經常在毛澤東身邊活動的那兩個女翻譯因個人恩怨對周恩來不滿，就大加渲染地挑選這些材料讀給毛澤東聽，說：誰還把你毛澤東放在眼裏啊！這也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恩來顯然從林彪出事、他上升為權力人物的第二位開始，就經常在考慮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說明問題的預演。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到了顯然是從周恩來當時衛士長張樹迎那裏得知的情景①：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伯伯，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着小跑往電梯方向趕。衛士長張樹迎扶着伯伯走進電梯，他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裏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裏出事了。果然，一進游泳池，毛主席臥室的門窗大開，平躺在牀上的毛澤東主席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彷彿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着。伯伯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主席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着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伯伯此時如釋重負，他激動地撲到主席牀邊，雙手緊握着主席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

林彪事件後，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周恩來應該是眾望所歸的接班人人選。在打開中美關係緩和大門的決策中，國際上幾乎都把周當成了這一決策的主角。一時期，國外報章對周好評如潮。經常在毛澤東身邊活動的那兩個女翻譯因個人恩怨對周恩來不滿，說：誰還把你毛澤東放在眼裏啊！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路線。

現在看來，周的這種表白毫無作用，反而證實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澤東的憂慮是一致的。但若說毛只是怕周會分割他的權力，也不準確，毛深知他在世時周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性。毛澤東更為擔憂的，是他死後周恩來會否定他的文革路線。「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他又繼續對周進行敲打。

國際形勢成為國內矛盾爆發的導火索。利用中美緩和時機來到中國的各級美國官員，一再鼓吹蘇聯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企圖利用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保護」，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同時又利用中國吸引蘇聯兵力，減輕美國在中東及世界其他地方與蘇聯爭霸的壓力。這個一石二鳥的計謀，首創者是基辛格。在這個背景下，1973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與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舉行了會談，兩國達成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協議》等十三個文件。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由外交部寫成了一篇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周恩來稱讚這篇文章：「寫得不錯。」毛澤東卻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一通」。

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 (David Bruce) 時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按照周恩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國處、蘇聯東歐司蘇聯處幾人討論，副處長張再執筆，寫成了一篇文章《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發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簽定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但是，周恩來對這篇與他跟布魯斯談話精神不同的文章卻批示稱讚：「值得研究。」又在給外交部的電話裏說：「寫得不錯。」②

7月初，王海容、唐聞生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問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新情況》寫得不錯，是根據周總理意見寫的，你給毛主席讀了嗎？張說沒有。於是唐便給毛讀，不料毛聽後提出異議，還舉例說明簡報的分析錯誤③。

姑且不論毛、周之間個人恩怨，僅就對當時世界上美蘇關係主要是勾結還是對峙的戰略判斷來看，周恩來稱讚《新情況》的傾向是欠準確的。70年代，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幾乎相等，出現了一種相持狀態，但這並不意味着兩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隱藏在表像之下的，是兩國更加尖銳的鬥爭。二十世紀後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美蘇之間的聯合是暫時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直至蘇聯瓦解。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了更高人一等的戰略眼光。

因此，毛澤東聽了女翻譯關於《新情況》的匯報，對此文大為不滿，說「放屁一通」。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後，7月3日，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司負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承擔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鑑，發揚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毛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布魯斯的談話紀要，稱讚說：「這下腰桿硬了，布魯斯就『舒服』了。」④

7月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張春橋及兩個女翻譯王海容、唐聞生進行了一次談話，仍然針對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評說⑤：

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甚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

都說此文(引者註：指外交部《新情況》簡報)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不要上喬老爺、姬老爺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7月5日，他在周恩來給外交部的信上又批示：「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7月15日，周恩來將外交部起草的檢查文章〈《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送毛澤東，並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澤東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中的「嚴厲」刪去，並批示：「檢討不要寫了」^⑥。

根據毛澤東這次談話精神，起草中共十大報告的張春橋在報告中寫進了實際是批評周恩來的這樣一段話：「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体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⑦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他唸到這段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說：對。

事態到此，並沒有繼續發展。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又釀成了更大風波。1973年11月10日的下午，一架美國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上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夾着他那隨時不離身的皮包，走下了舷梯，開始了他的第六次訪華。和以前五次相比，這次並沒有引起外界更大的關注，因為，中美兩國已經在5月互設了聯絡處，結束了帶有神秘色彩的暗中交往。一場風暴，發生在基辛格走後^⑧。

基辛格走後王海容、唐聞生來到毛澤東處，從張玉鳳那裏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甚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11月17日，聽了兩位女翻譯匯報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雷霆震怒」。

二 「幫周」會議的風暴

基辛格走後的第二天，王海容、唐聞生來見周，拿着周、基最後一次會談的記錄稿，有些段落下面已經畫除了紅槓槓。王、唐將有槓槓之處唸出來，一一詢問：「您是這樣講的嗎？」周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⑨

王、唐來到毛澤東處，從張玉鳳那裏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說，那就怪了，這麼大的事，總理為甚麼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覆建立核保護^⑩。

11月17日，聽了兩位女翻譯匯報的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雷霆震怒」。當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

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①。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事先了解毛澤東態度的江青首先發難，斥責周恩來迴避實質，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拍案而起與之爭辯：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大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江青冷笑說：走着瞧！會後，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18日，王海容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和以前與美國國防部長會談的葉劍英的錯誤。從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釣魚台十七樓開會，開始還只針對中美會談中周的問題。但是沒過幾天，毛澤東住處游泳池傳來話：後排議員要參加批判修正主義。政治局會議多加幾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幾個人，一塊兒討論討論。外交部負責人姬鵬飛、喬冠華、黃華、仲曦東及擔任中美會談翻譯的章含之、羅旭共六人，被毛澤東點名與會。

會議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周恩來主持變為王洪文主持，改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外地的政治局委員也連夜趕來參加。王海容、唐聞生是這次會議的毛澤東聯絡員，每天由她們向毛匯報會議情況，再把毛的指示傳達給會議，控制會議走向。由江青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一個「幫助周恩來」小組，成員有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汪、華後來退出，全由「四人幫」和王、唐做主。

會議中，江青和張春橋等人肆無忌憚地批判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給美國人下跪」。範圍已經擴大到從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以來的所有外交活動，繼而上升到權力之爭。江青說，這是繼林彪事件之後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錯誤路線的頭子」。王海容特地說明：7月4日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中批評的「賊船」，指的就是周恩來。與會的全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列席者，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對周恩來進行了批評^②。不明真相的個別人如許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還有人趁機討好江青。周恩來本人進行了過份的自我檢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面擱個茶几，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葉劍英儘管解釋自己不管外交，與美國人談判是被周拉進來的，也沒有逃脫批判矛頭。有一次，葉劍英坐在後面，江青大聲叫他坐到前頭來。葉回答：「坐前頭就前頭，怕甚麼！」周恩來因為手顫抖，請喬冠華幫忙整理記錄，誰知遭到女翻譯怒斥喝止，規定周的檢查只准自己寫，不准秘書幫忙。會議結束，第一個讓周恩來出來，會議再繼續進行，商量下一次怎麼批判。周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面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衛士趕緊用雙手架着他上電梯^③。

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從「十次路線鬥爭」說法而來。即文革中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鬥爭」。這「十次路線鬥爭」，後來被歷史證明，有些並不是「路線」性質，還有些根本就是顛倒是非的（如對彭德懷、劉少奇）。江青將周恩來說成「第十一次錯誤路線」的頭子，目的就是想將他置於死地。會議期間，她迫不及待地將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從11月21日起，中央政治局每晚在釣魚台十七樓開會，江青和張春橋等人在會上批判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江青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王海容特地說明：7月4日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中批評的「賊船」，指的就是周恩來。許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

會議是在極端保密情況下進行的。出入會場，專為會議服務的人員都經過挑選和特殊的交代。剛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來的服務人員流淚說：「這哪裏是甚麼幫助總理啊？他們明明是整總理嘛！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連江青的服務員小趙也哭着對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葡萄酒慶祝乾杯呢！」原來主動向周請示問好的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員，現在見面盡量迴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示冷淡。連對周的隨從工作人員也不敢理睬，把他們冷落在一邊。周的隨員互相之間甚至提起了要準備被捕。只有葉劍英、紀登奎暗地裏向他們關心問候周恩來的身體狀況^⑭。

在這十多天裏，周恩來仍然要繼續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動。他先後會見了阮友壽率領的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塞克率領的塞內加爾政府代表團、岡崎嘉平太率領的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訪華團、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 (Birendra) 和王后艾什瓦爾雅 (Aishwarya)，與他們進行多次會談，簽定協議。周恩來的疲倦和痛苦，被細心的日本人發現了。11月28日，岡崎嘉平太在日記裏寫道：一個小時的會見，「總理消瘦，顯得疲憊……」^⑮。以後，基辛格也寫到：「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他的地位已經遠在毛主席之下」^⑯。

按照周恩來對鄧穎超的交代，這是他文革以來繼「伍豪事件」風波後面臨的第二個最困難局面。

「幫周」會議中間，毛澤東認為會議水平不高，江青發言有些生拉硬拽，決定調兵遣將，讓鄧小平中途參加。他問前來匯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了解鄧小平的態度。鄧小平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以後，到了最後一兩天，他發了一個言。發言的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了周恩來。他指出，周的性質不是像江青說的那樣「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而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⑰。寥寥數語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如何怎樣看待國際戰略的問題。他認為，對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能憑一次談判和一句話來進行判斷，關鍵要看大形勢。他認為，目前來看，要講打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但如果真打起來也並不可怕。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會議批周的主旨。

當王、唐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代也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因此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⑱。這一事情說明，毛在對鄧進行着關鍵性的觀察，將要決定委任鄧以重任。

毛澤東了解到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以後，12月9日，他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後，曾分三批先後同王洪文、周恩來和翻譯王、唐談話，指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⑲他還說：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幾個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於人世的

「幫周」會議中間，毛澤東認為會議水平不高，決定讓鄧小平中途參加。在會議的最後一兩天，一直沉默的鄧小平發了言，他指出，周的性質不是像江青說的那樣「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而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毛澤東得知鄧的發言後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代也會發言的。」將要決定委任鄧以重任。

了^㉔。毛澤東還握着周的手，指着女翻譯說：「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㉕於是，「幫周」會議宣告結束。王海容不動聲色地對周恩來衛士高振普說：「你又可以吃宴會了。」^㉖意思是周恩來仍然負責外事工作。

但是，毛澤東既然肯定了「幫周」會議，周恩來面臨的態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根據毛澤東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㉗。對周恩來的「批評」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他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裏來。」在談到打仗問題時，他再次指責「投降派」說：敵人「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兒皇帝的」^㉘。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 (Kenneth Kaunda) 後，對陪同接見的周恩來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着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這年夏天，毛澤東會見外賓，因為沙發不夠，周恩來便坐到椅子上，把沙發讓給翻譯。毛看到了，指着翻譯王、唐對外賓說：總理可憐哪，被這些娘們整得這個樣子^㉙。

這次「批周」事件就這樣結束了。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離不開，又總不滿意，實質是覺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卻絕不會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機鬧事，結果也被毛澤東批了一下。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讓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團大失所望^㉚。

三 周恩來究竟對美國人說了些甚麼

風波因對美方針而發。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訪華。在會見中，毛澤東曾經談笑風生地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的「一條線」戰略，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

毫無疑問，在此之前毛澤東、周恩來的聯美反蘇原則是明確的，也是一致的。那麼，是周恩來在基辛格第六次訪華中確實說錯了話，還是毛改變了聯美反蘇原則而「出爾反爾」？1999年初，美國國務院宣布解密一批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其中包括當時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為解開這個謎案提供了一些根據。

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

1973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 (Melvin R. Laird) 向尼克松總統提交了核武器應用政策草案，其中關於「中蘇案例研究——一個例子」假設提出：「蘇聯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清除中國的核能力。在用核武器打擊了發射場之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接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對陪同接見的周恩來問：「總理，你怎麼樣了？」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毛澤東笑着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周也笑了。這年夏天，毛澤東會見外賓，因為沙發不夠，周恩來便坐到椅子上，把沙發讓給翻譯。毛看到了，指着翻譯王、唐對外賓說：總理可憐哪，被這些娘們整得這個樣子。

後，蘇聯空軍奪取了某些中國核武器發展和製造設施，並開始從蒙古和中亞進行地面會合作戰，並威脅侵略滿洲。」「此時，中國向美國尋求幫助。」報告提出美國的對策是，用核武器襲擊蘇聯軍隊，支援中國²⁷：

兩個地區核選擇被加以討論：用戰鬥轟炸機對中國境內某些蘇聯控制的空中支援機場進行打擊，以及用戰鬥轟炸機對侵入中國境內的蘇聯核能力進行打擊。

四個有限核選擇被加以討論：

- 1、B-52打擊蘇聯侵入新疆的軍隊。
- 2、用B-52或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的鐵路和公路走廊以截斷其供應。
- 3、用B-52和海軍飛機打擊經挑選的空防系統。
- 4、用B-52和北極星導彈打擊蘇聯在本土地基的常規力量。

基辛格應該就是帶着這個「核保護傘」計劃來到北京的。當天，也就是11月10日，晚上9時25分，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同行的官員洛德 (Winston Lord)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先向周恩來簡要介紹了5、6月他訪問蘇聯時與勃列日涅夫會談的情況。他別有意味地特別提到這樣一件事：

勃列日涅夫安排和他一起去樹林打獵，實際上是從一個搭好的台子上射擊驅趕來的動物。勃列日涅夫津津樂於此道，疲而不倦。打獵結束後，在用野餐時，勃列日涅夫忽然屏退左右，只留下翻譯，鄭重其事地對基辛格說：「蘇聯和美國有共同的責任阻止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怎樣阻止呢？基辛格立刻意識到，這就是要對中國核基地進行毀滅性打擊。因為在1964年中國原子彈即將試驗成功之際，美國約翰遜 (Lyndon Johnson) 總統也曾向蘇聯提出過相同的襲擊中國核基地的建議，那時被蘇聯拒絕了。

這回，同樣的建議再次提出，只不過雙方調了個兒。基辛格表示，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朋友，沒有認識到美蘇兩國有這樣的共同責任。勃列日涅夫不耐煩地吼着：「好吧，你們可以交你們想交的任何朋友，但你們和我們必須是夥伴。」他再次重複：「我們有共同的責任防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

基辛格對周恩來說：「自那時候起，蘇聯已三四次在限制核武器會上提出與我們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他們這樣做意味着蘇聯應與美國享有同等權力，並且還要有足夠的武器摧毀中國，這些武器還應隨着中國的形勢變化而每年有所增加。」

周恩來對基辛格的這一說法提出疑問：「蘇聯有人造衛星，每天都可以觀測中國。那他們還想要交換情報？」

基辛格解釋說：「他們想從我們這裏得到一個暗示，當作一個合作的標誌，而不是單單情報。他們希望我們接受的是破壞中國的核力量的要求。」他還說，美國政府內部安排了一些研究，向中國提出可以使中國在遭到蘇聯突然襲擊時減少軍隊傷亡和提前報警的技術建議，並表示可以由隨行的豪爾 (Jonathan T. Howe) 司令來具體介紹。這件事只有四五個人知道。

周恩來並不相信蘇聯馬上要攻擊中國，但他最後還是說：「不管怎樣還是謝謝你的情報和忠告。」

美國確實有一個「核保護傘」計劃，基辛格應該就是帶着「核保護傘」計劃來到北京的。基辛格先向周恩來簡要介紹了5、6月他訪問蘇聯時與勃列日涅夫會談的情況。勃列日涅夫對基辛格說：「蘇聯和美國有共同的責任阻止中國變成一個核大國。」基辛格表示，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朋友，沒有認識到美蘇兩國有這樣的共同責任。勃列日涅夫不耐煩地吼着：「我們有共同的責任防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

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說：蘇聯野心很大，能力不夠，「它在亞洲要對付這麼多方面，要對付太平洋、日本、中國、南亞，好幾個國家。統共只有一百萬軍隊，守也不夠，更談不上進攻。」當基辛格說到蘇聯首先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時，毛澤東笑了：「我們的核武器只不過是一個小手指頭。」顯然，基辛格沒有能挑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恐懼，美國提供情報援助的建議也沒有機會提出來。

11月11日下午3時15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廳與基辛格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基辛格也許是出於真心，欽佩地對周恩來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着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談問題，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不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恩來馬上制止他的話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你剛才說我們的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本着這種態度，我們甚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11月12日下午3時至5時2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賓館三號樓進行第二次會談。然後兩人驅車前往中南海，毛澤東要會見基辛格。

毛澤東對基辛格的用心一目了然，說：「蘇聯統治不了，它野心很大，能力不夠。你看，你們當年在古巴把它一威嚇，它就跑了。」

基辛格說：「我們知道蘇聯在中國邊境每一個師的位置。」

毛澤東說：「它在亞洲要對付這麼多方面，要對付太平洋、日本、中國、南亞，好幾個國家。統共只有一百萬軍隊，守也不夠，更談不上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基辛格立即矢口否認美國想這樣做。

毛澤東下結論說：「所以我的意見是蘇聯野心很大，歐洲、亞洲都想霸佔，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它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當基辛格說到他對周恩來說過蘇聯首先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時，毛澤東笑了：「我們的核武器只不過是一個小手指頭。」

這個比喻的意思是：首先，蘇聯不會把中國當作主要敵人，與蘇聯擁有的幾千枚導彈相比，中國的幾十枚導彈對它構不成威脅，蘇聯的戰略重點還是在歐洲。其次，中國人從不迷信核武器，當年沒有核武器，中國還是在朝鮮與美國交了手。

顯然，基辛格沒有能挑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恐懼，美國提供情報援助的建議也沒有機會提出來。

11月13日晚10時，基辛格與周恩來、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再次進行會談。基辛格進一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一、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予援助。」「目前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你們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你們。」「另一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上簽署協議，就像我們和蘇聯簽署的一樣，並且也建立一條熱線。」基辛格還說：「我只是在考慮如何建立一條直通北京，且能避人耳目的熱線。我們也可以提供某種雷達的科技，但是你們必須自己去建造。」

對此，周恩來只謹慎地回答：「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去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着。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

當晚的會談一直進行到次日也就是14日的0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要馬上答覆，要報告主席。立即前往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

14日早上7時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最後一次「一對一」會談。參加者僅有中方的周和翻譯，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

對美國的建議，周恩來沒有明確答覆，只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

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的人是我本人與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⑳。」基辛格最後留下了兩份協議，一份是建立熱線的，另一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㉑。

到基辛格離開北京前，美方提供情報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明確結果，周恩來僅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實際上，由於此後的周受到批判，中方以後再也沒有提起協議問題。

送走基辛格後當天即1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提交了送審基辛格訪華公報稿的報告，當日毛澤東等人圈閱^㉒。以後，就有了兩個女翻譯登門核對會談記錄的軒然大波。

撥開所謂「幫周」會議的迷霧，可以看到：這次會談中，周恩來是遵循毛澤東的聯美反蘇外交原則進行的，他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放棄甚麼。美方雖然有個「核保護傘」計劃，但基辛格鑑於以前黑格 (Alexander Meigs Haig) 將軍提出「保護」被中方怒斥的教訓，只謹慎地提出了建立熱線的建議，也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軍事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極為有利，何樂而不為？畢竟中美兩國在1988年還是建立了熱線。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息來誘導中國，但畢竟判斷權在中國。這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

同時，周恩來也確實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了一定的興趣，雖然他沒有做明確的許諾，也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但是，畢竟有了基本接受和繼續商議的表態。基辛格的「核保護傘」建議雖然會給中國帶來某些實際好處，但是這種直接商議對中國領土提供軍事保護的建議，顯然會傷害文革時期本來就神經過敏的中國領導人的自尊心。從程序角度上說，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請示最高領導人也是難以想像的。尤其是周恩來這種指定中方繼續會談負責人只有周、葉、蔡的表態，發生在毛澤東已經產生疑慮、批評外交部《新情況》的時候，事後周又沒有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對一貫謹慎的周恩來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時失策。

毛澤東是否「出爾反爾」？關鍵在於他是否同意了周、基13日晚會談時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合作建議。據喬冠華回憶，14日早晨會談前周對他說，毛主席同意了，現在就答覆基辛格。但是，據張玉鳳的回憶，周確實事前沒有報告毛，其他有關著作也都記載是周恩來當夜因毛已睡並未能見到毛，沒有報告^㉓。由於當事人均已作古，這只能成為一個永遠的謎了。毛澤東的一貫態度是比較明確的，一方面作出聯美反蘇的決策，一方面警惕美國利用蘇聯壓力打「中國牌」和控制中國的圖謀，因而強調反對「投降主義」。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對美國人的建議仍然耿耿於懷。他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 (Dawda Kairaba Jawara) 時說，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

與基辛格會談中，周恩來遵循毛澤東的聯美反蘇外交原則，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放棄甚麼。但是基辛格的「核保護傘」建議，顯然會傷害文革時期本來就神經過敏的中國領導人的自尊心。對如此重大的問題，不請示最高領導人也是難以想像的，事後周又沒有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對一貫謹慎的周恩來來說，不能不說是一時失策。

表面上，之所以發生這場風波，是在文革的不正常狀態下，複雜的中美蘇三角外交決策完全依賴毛澤東個人決斷，信息反饋僅僅信用個別身邊人的匯報。歸根結底實質上還是毛對周的基本判斷在起作用。當然，毛的態度和江青集團上綱上線打倒周恩來，是不同的。

註釋

①⑨⑩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頁330；331-32；333。

② 宗道一：〈153期《新情況》和基辛格第六次來訪給周恩來帶來的政治災難〉，《中華兒女》（北京），2001年第9期，頁6-7。

③⑩⑮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④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6-57；356-57。

⑤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下輯。

⑦ 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3年9月1日。

⑧ 外交部老人戲說，奇數年訪華的基辛格是個「災星」，他1971年訪華後出了林彪事件，1973年訪華後開始批周，1975年訪華後開始批鄧。

⑪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670。

⑫⑬⑳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88；288-89；289。

⑭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10-15。

⑮ 岡崎嘉平太：〈我的人生之師〉，載《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484。

⑯ 伯爾（William Burr）著，龐偉譯：《基辛格秘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頁185。

⑰ 採訪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

⑱㉓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34-35；636。

⑳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472。

㉑ 毛澤東與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會談記錄，1973年12月9日。

㉒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37。

㉔ 據王、唐當時的解說，「兒皇帝」是指周恩來。

㉗ 菲爾·奧迪恩致基辛格備忘錄，1973年6月8日。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 June 8, 1973. Top Secret Subject: NSSM 169—Nuclear Policy June 8, 1973. 檔案由沈志華、李丹慧提供，謹表感謝。

㉘ 指中方參加會談的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

㉙ 以上引文均見：伯爾著：《基辛格秘錄》，頁189-243；傅建中編著：《季辛吉秘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153-76。留下的協議中是否就是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關於「核保護傘」的內容，尚不明確。

㉚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670。但周是否當面匯報了14日晚基辛格提出的軍事合作建議，仍然不得而知。

㉛ 採訪喬冠華記錄，1982年4月；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由於喬並未直接見到周向毛報告，因此筆者傾向於周末向毛報告之說。